

追懷吳鼎昌主席

—— 貴州政壇憶往之九

選任文人主席原由

貴州省政府主席，抗戰以前，本是顧祝同將軍，自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事變後，全面抗戰，

京滬一帶劃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由蔣委員長自兼，而以顧將軍為副。淞滬戰爭告一段落，國民政府西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由顧將軍貢除，再無回任貴州省主席的可能了。於是中央發表吳鼎昌達諭先生繼顧將軍之任，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的事。翌年，吳主席來黔就任。這是當時惟一

的文人省主席。就戰時的特殊情形來說，軍政一體，省主席由軍人擔任，實有其必要。當時的貴州，已經是處於軍政上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中央簡派一文人來擔任主席，這是特別對吳氏的倚重，更有其特殊的用意。由於當時雲南的龍雲，頗具地方軍人的色彩，貴州是通雲南的要道，廣西是李白的勢力圈，最富地方色彩。如果黔主席派一個軍人擔任，不免使滇桂當局引起猜嫌，對抗戰的大團結，或將發生不良的影響。蔣公心細如絲，明徹如鏡，故簡派文人任黔主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人事運用。依我的觀感，吳氏的長處

，是有擔當，有魄力，在建設方面有其理想，且能適應環境。當時貴州所需求的是資源開發，地方安定，中央軍事第一政策的確實執行等重要原則，無疑的，由吳氏繼任省主席是適當人選，吳氏也的確完成了建設貴州協和鄰省的任務。

吳氏是二十六年十二月接篆視事的，至三十一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國府改組，由蔣委員長繼任，原任文官長魏懷求去甚堅，乃由吳氏任文官長，離開了貴州省主席的職務。計其先後主省政的時間六年多。在這一段期間，我始終是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和貴陽市長。因此，對吳主席在貴州的施政，印象最為深刻，我的建設貴州的計劃，得以順利實施，得到吳主席的全力支持，回憶往事，緬懷哲人，仍使我有無窮的感慨。

由洋翰林得意北洋
我和吳故主席在他沒有到貴州以前，並無一面之緣，因為在他擔任實業部長之前，在北方的時候多；他擔任實業部長的時候，我已奉派至西南公幹，因此無法相逢，但在當時，吳在北方的

，是有擔當，有魄力，在建設方面有其理想，且能適應環境。當時貴州所需求的是資源開發，地方安定，中央軍事第一政策的確實執行等重要原則，無疑的，由吳氏繼任省主席是適當人選，吳氏也的確完成了建設貴州協和鄰省的任務。

（岳軍）先生是小同鄉；而且他是四川官費派送日本留學，初在成城學校學軍事，後來改讀商科，研究財政經濟。成城學校是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先總統蔣公和張羣先生就是在這個學校肄業的。辛亥武昌首義時，蔣張二公尙在肄業期間，而吳氏則早已同國參加清政府的科舉考試，則吳氏在成城的時間，應較蔣張二公略早。不過吳氏與張公極熟，根據黃季陸的記憶，他們是可以當衆隨便開玩笑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吳與蔣張二公，在日本時即已相識，他日有緣，當向張岳軍先生求證之。

吳在東京，即已加入同盟會，但他似乎和戴季陶先生一樣，對於叫口號的羣衆革命運動，不甚熱心，他是屬於求實學做實事的一派。當時留日學生中屬於這一派的不在少數，如丁文江雖同情革命，但頗受革命運動之影響，甚至舍日本而改赴英國，便是一例。他本是官費留學生，故回國後，參加清政府對留外學生所開特別考試，以第十七名中式而為商科進士，復經朝考而進為翰

林，發往翰林院任檢討，此即所謂「洋進士」、「洋翰林」也。清政府未葉，疆吏中知道識拔青年才雋者不多，趙爾巽不失爲其中之一人，時趙任東三省總督，開府瀋陽，耳吳氏之學，延爲本溪湖煤礦總辦，大清銀行成立不久後，改任該銀行科長，旋被調任江西分行總辦。大清銀行即中國銀行之前身。袁世凱政府成立後，大清銀行改組，吳氏即任監督。故吳氏雖爲同盟會會員，並未參加革命運動，但在金融方面，卻能一展所長，學遂其用，亦救國之一途也。民國三年，改任天津造幣廠廠長。

吳在北洋政府中，特別受知於段祺瑞的最高智囊人物徐樹鍾。此人文武兼資，才氣縱橫，是所謂皖系的中心，段祺瑞的靈魂。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不容於全國，氣憤而死，黎元洪以副總統扶正，段祺瑞初度爲內閣總理，吳氏之爲國務院參議，即爲徐樹鍾所保舉。民國七年，段氏三度組閣，更力保爲財政部次長，代行部務，其保舉電文中，甚至說：「實辦財務，以吳達詮爲最宜，才力、學力、魄力、識力，公同贊許，毫無閒言。慮其資望稍差，位以次長，十分妥愜。」有此好次長，無須彌縫，以免束縛，爲長養達詮資望計，數月之內，應以總理兼任，如不願兼任，則以潤田兼署，亦一辦法。」電中所稱的燕是指梁士詮，字燕蓀，即後來稱爲梁財神者便是。潤田乃曹汝霖之字，時任交通部長。由此，可知徐樹鍾對吳氏賞識之深與扶植之力。段遵其請，以曹汝霖兼財長，而以次長畀吳氏。吳氏亦以此故，而參與段祺瑞的機密。南北和議中，吳即以第

二名代表的地位，隨朱啟鈴等南下，與革命黨方面的代表，在上海參加和平談判。這是吳氏在北洋政府春風得意時期。直皖戰爭起（民國九年），皖系覆敗，段祺瑞下台，徐樹鍾被通緝，吳氏之財政次長，亦被免職，在北洋政府的政治生涯，至此告一段落，或以吳氏之在北洋政府工作，擬之以王亮疇（寵惠）先生等，此則不然，亮疇先生等之留任北方，係受國父的指示，吳氏則不然，實不可以相提並論。

經營銀行辦大公報

吳氏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生活結束後，重回其金融界的本行，任鹽業銀行經理。未幾，發起金城、大陸、中南、鹽業四銀行之聯合準備庫，而被任爲主席。我國私家銀行之有準備庫，自此始。此即後來被稱爲小四行，以別於國家銀行的中、中、交、農四大行。小四行業務之蒸蒸日上，使吳氏在金融界之地位，日益鵠起，成爲北方的金融中心人物之一，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亦有其相當的地位。

顧吳氏對於新聞業，頗有其濃厚的興趣。時新聞界的傑出人才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都是吳氏的摯友。民國十三年，吳與張胡二先生聯合，以現金五萬元的代價，接辦天津大公報，資金全由吳氏擔任，以新記公司名義發行股票，張胡二位出的是人力股。天津大公報之接辦，是由吳氏發起的。吳氏認爲國家需要一家獨立的報社，不受政府津貼，不受任何壓力，可以發表對國家社會有益的言論和消息；當時除大公報外，尚有國

聞週刊、國聞通訊社，都是同樣的性質。三位先生分工合作，吳任董事長，張主筆政，胡主經理。他們三位常在新聞記者上班以前的七時至九時，相會晤，交換意見，討論問題，最後常由季鸞先生執筆撰寫社論，故天津大公報之評論，常爲三位先生的意志之結晶，他們的意見，常能代表北方知識分子所欲言而不得言的心聲，因此大公報在北方新聞界中，異軍突起，一時成爲輿論的中心。季鸞先生健康不佳，因此在他們會談有了結論以後，吳氏常常自告奮勇，由他執筆，但最後仍由季鸞潤色後發表。他們並且相約，不入仕途，後來吳氏被國民政府任命爲實業部長，即辭去大公報的董事長，一切聽由張胡兩先生處理，不再顧問，但張胡二人，如有大公報之重大決定，都先徵求吳氏意見，吳氏亦照例全部同意。如九一八事變，繼之以熱河的被侵，殷汝耕冀東傀儡偽政權的成立，華北五省自治的要求等，風聲日緊，張胡二位決定在上海開辦大公報，其後又在香港開辦大公報，重慶發行渝版，勝利後在上海復刊，事前都將全盤計劃，報告於吳氏，吳氏都是全部接受，不參加任何意見，都是例子。他們三位的合作，始終最愉快的。以道義結合，患難相共；以利害結合，利多則爭，利盡則散。他們三位先生的結合，真可以說是基於道義的原則，樹立了真正合作的典型。

吳氏與丁文江同型

說者往往以吳氏之出任實業部長，認爲是「政治南征」的象徵。以作者的觀感，認爲與事實

不合。作者認為吳氏之出任北洋政府要職，是做事而不是做官，他對於做官的興趣，似乎不高，而對於盡其心力為國家服務，則有濃厚的興趣。

當時一般學者以學術報國的風氣，似甚流行。如丁文江，他以我國第一位地質專家為國家服務，矢志不做官，但是他做了孫傳芳的淞滬商埠督辦（相當於上海市長），以致傅斯年憤然的說：我有一機會，一定要殺了丁文江。但是丁文江卻有另一套的理由，他認為在我們國家當前的時代，要做事，便需做官，做了官，才有權做事。他做淞滬商埠督辦以後，設計建立上海新市區，以對抗畸形的公共租界。當時上海的重要碼頭倉庫，都在楊樹浦與黃浦灘一帶，是客貨上下的中心。我國船舶出入，都在公共租界以南的十六浦以上，在地位上先吃了大虧，無法相競。丁氏計劃，把市中心設在江灣，把吳淞碼頭和倉庫好好建築起來，並與淞滬鐵路、滬杭鐵路、滬寧鐵路即京滬鐵路，舉行海陸聯運。如此，輪船一進吳淞口，便是碼頭倉庫，無須再至公共租界碼頭。這是最有效的對抗公共租界的辦法。傅氏誤會，從此冰釋。

九一八事變以後，繼之以華北的緊張氣氛，最高當局，苦心焦慮，急謀集中全國優秀人才於政府，救國會議之召開，國防參議會之組織，以及蔣廷黻、翁文灝等之延入政府，都是此項用心的一部分。吳氏經營小四行與大公報，都卓著成績，其被器重而受延攬，不足為奇，何況此時，北洋軍閥久已消聲匿跡，更何有「政治南征」之可能！

有關抗建大計政績

吳氏在實業部長任內，後來轉任軍委會第四

部部長任內，着實替國家做了不少有關奠定抗日勝利基礎的重大事情。茲舉其大者，略述如下：

其一，接受農業專家的建議，致力於小麥與雜糧的改良與推廣，當時抗戰已經開始，糧食供應的自給政策，遭受嚴重的破壞，吳氏商得中國銀行的同意，支持糧食的貸款，在山東、安徽與江蘇北部，推廣小麥與雜糧的種籽改良與種植方法，改良，因獲大量豐收，使這一地區的農家收入大增，感念政府之德政不已。雖然由於軍事情勢的逆轉，政府西遷，中國銀行的貸款無法收回，但此區區的損失，得到人心的悅服，較諸馮謬為孟嘗君市義，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了。

其二，支持華西興業等公司的組織，大家都知從重慶上清寺至化龍橋必須經過牛角沱，就可以發現一所當時稱得上現代化的大廈，這就是華西興業公司所在。這是一個多目標的實業公司，在第四部長任內促成的。抗日戰爭的主要基地是四川省，對於四川的經濟建設之進展，實對抗戰勝利有關鍵性的重要，吳氏對此認識甚深，故在戰前即贊助成渝鐵路公司的建設，為了建設鐵路，需要大量枕木，因而贊助中國木業公司，開發岷江上游的森林，以濟其用。此外，如四川水泥公司，其三，戰區工廠的遷移。我國工業分布，受

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侵略的影響，都以沿江沿海的大都市為中心，如上海一地，就是當時最大的工

業都市，上海是首當其衝的戰區，這一地區的工廠，如不設法向內地遷移，不僅有資敵的可虞，而且使內地工業缺乏了可資建設的器材。最高當局對此早經注意，特設遷廠機構以主持其事。吳氏既任實業部長，後來又任第四部長，都在他主管範圍內，對此自當積極執行，不負重託。無奈資本家都現實而短視，臨危始接受命令，故遷廠成績不如理想，但科技人才之內徙者實在不少，對後方工業建設的貢獻，實在很大。

和劉湘的一段交道

我常恨西南各省之直接接受中央領導，為時太晚，以致影響經濟建設的發展，增加了戰時的損失，也延長獲勝的期間，但是共匪的竄擾，終於使西南各省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政令，時距全面抗戰，尚有三年左右的期間，總算不幸中之大幸。紛擾的川局在民國二十三年始在劉湘蒲澄將軍努力之下，完成統一局面。吳氏川籍，時任實業部長，因調命入川，一方面考察實業，一方面與劉將軍聯絡，實際上是含有觀察劉將軍真意向，也就是對國家抵抗日本侵略的真正態度。經過多次晤談，情況良好，但還把握不住劉將軍的確實趨向。吳氏臨行之前，要雙方都熟的朋友向劉將軍率直地提出一個問題，要劉將軍答覆。這個問題，便是所謂「此後會不會造反？」劉氏也率直地回答：「我如果要造反，還會和你們作朋友嗎？」吳氏得此堅決答覆，任務完成，回京履命。

此後，不過半年，劉將軍就帶領重要幹部如劉蹊等到京，面謁最高當局，故吳氏對劉將軍與中

央關係的鞏固，也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喜歡多聽而不多言

由於吳氏是一個實幹的實業家和金融家，因此最高當局畀以翼蔽抗戰基地最重要的鄰省貴州主席的重要任務。他在受命之後的第一感想，就是「這個省雖小雖窮，但在戰略上卻是十分重要，希望把這個省能够治理得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吳氏至筑就任。他向來抱定的宗旨：「聽人說話要聽完，自己說話不要說完」的原則，這也就是說他不喜歡對人多說話，所以當時並沒有發表什麼施政方針等意見。但是他對治理貴州，卻是胸有成竹，他對地方派系，採取執簡馭繁的原則，對貴州建設採取交通為重、工業為先、農業為本的原則。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一日，貴州省參議會舉行首次會議，這纔宣布了他對貴州建設的部分宗旨，這次報告，是口頭的說明，特別着重在交通方面，分鐵路、公路、水路、交通工具與電訊等項。我還依稀記得他報告的重點：

• 公路方面注重路線的擴建與路面的整修，遵義至松桃公路，是省內的重要公路之一，就是在吳氏主政之初完成的，也是我的貴州交通建設計劃的一部分。貴州企業公司是吳鼎昌就任主席不久以後創設的，其內容包括電力建設、工業建設、農業建設、特產經營等，我是這一公司的董事長，一切計劃，都是由我提出，經吳氏的同意而進行的。我是貴州人，建設我的故鄉，有我的熱忱，難得吳氏本其職責所在而予以全力支持，使我的工作，能够順利推行，順利發展。人言吳氏能納

善言，以我本身的經驗，我完全證明其正確性。

邀沈宗瀚改進農業

吳氏對於貴州的農業建設，有其特殊的貢獻，在我回憶貴州農業建設的若干記載，常常提到農業品種的改良，交由農業改進所研究的話。貴州設置農業試驗所，便是吳氏對貴州農業改進的大事之一。吳氏在實業部與大本營第四部長任內，即注意糧食增產，由農業專家沈宗瀚博士主持其事，大家都知道沈氏伉儷在農產品品種改良，有其特殊研究與貢獻。在吳氏擔任黔主席以前，沈氏對西南的糧食生產情形，已作調查。及吳氏主黔政，即邀沈氏至黔，協助改進貴州的農業。沈氏建議：貴州應在一年內完成土地陳報，以增田賦而抵補鴉片稅之缺額；應劃清農林土地之界限，以免陡坡的土壤冲刷，形成平地造林之不經濟的土地利用；舉辦農田水利，如築壩攔水、鑿池積水、水源開濬，以減水旱之災；確定租佃最高額，增高農民增產之興趣，普設合作金庫，以免農民遭受土豪劣紳高利貸之剝削，獎勵熟荒墾種，十年內不增田賦；嚴禁燒山，保護天然森林。凡此原則，都經吳氏首肯，一一付諸實施。沈氏又建議把省立的若干試驗所合併成為農業改進所，與中央農業試驗所合作，俾得技術方面的支援。吳氏對此建議，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如果一個試驗所得不到好所長，那豈不影響農業全部的改進？沈氏認為貴州經濟財力有限，無法多聘專才，得一已難，何況得到幾個？他以多設試驗所，比作開幾個小雜貨店，不能解決物品供應問題，不如合而為一，延攬一個好所長，如此經費稍多，由他負責督促各種試驗，較易收效。吳氏從其議。這是沈氏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

特別商諸中央農業試驗所，放棄其他職業，常川在黔，負責進行，所設水稻改進試驗、小麥改進試驗、油菜改進試驗等，都有良好的成績表演，並繼之以辦理推廣業務，為貴州解決了許多農業上的問題，樹立了農業改進的典型。後來其他各省，根據貴州試驗的成功，紛紛成立省農業改進所。這個改進所二十七年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由皮作瓊任所長兼森林系主任，沈氏任農藝系主任，凡一年而後去，其他如病害防治、蟲害防止、水旱防止以及畜牧獸醫都由專人負責，其人才都由中央農業試驗所推薦，一時稱盛。這是吳氏知人善任的一個例子。

同善社與幫會之亂

吳氏對於貴州治安最大的貢獻，我還特別提出黔南與黔東的共產匪徒作亂之平定。

黔省是陪都重鎮所在的四川南方的屏障，中央對於貴州的防務，異常重視。黔東與湘西毗連，而湘東已成戰場，故黔東特派國軍勁旅一師駐防，以備不測。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後，日本急求中國戰場之軍事早告段落，以便抽調兵力，參加其他地區作戰，乃唆使汪偽組織，利用同善社等迷信組織，與湘西與黔東的幫會組織相結合，幫同種植鴉片，抗稅抗糧，並反對徵兵服役，這些含有毒性的口號，都很能煽動一般愚民的響應。共匪乘間混入，實行它擾亂國

軍後方的陰謀。由於長沙三次大捷和國軍駐防的鎮壓，其初尚是辭辭，無足輕重。三十一年，日軍攻入緬甸，國軍增援英軍，黔東駐軍，被調入緬，一時無適當的兵力填補，黔東遂成真空，予宵小可乘之隙。而共匪遂在漢苗雜居的貧瘠地區，加強抗糧抗兵和種鴉片的煽動，以不許種鴉片而要納糧當兵爲官逼民反，於是各地暴亂相繼發生，松桃縣首先受害，其次動亂者爲青溪縣，甚至黔東專員公署所在，向有黔東門戶之稱的鎮遠縣及附近的三穗縣都被攻陷，專署所屬的保安大隊，反被擊潰，全省爲之震動。匪更進陷文德關，攻入台江、劍江兩縣，清水江流域的交通樞紐施洞口，亦陷匪手，形勢相當嚴重。其時的黔省，在軍事方面是屬於滇黔綏靖區，由滇主席龍雲任主任，黔主席吳氏任副主任。黔省則分三綏靖區，即黔東區、黔南區與黔西區，全省武裝部隊，只有省保安團，可資調動者僅黔西綏靖區的三個保安團。

剿撫兼施三月建功

其時任黔省保安處長者爲黔籍的韓文煥同志。韓同志對於保安隊之訓練，已有一番部署，如開辦訓練班，調訓各部官佐受訓，授以蔣公的廩山訓練記實、曾胡治兵語錄等課程，特開演習場，以最新戰術施以訓練，故戰鬥力尚強。至此，韓同志向吳主席進言：希望國軍來黔剿匪，最近必無可能，使匪坐大，實爲非計；惟有使用黔西保安團，集中攻擊清水流域之匪共，一舉破之，其餘零星匪共可以招撫解決之。吳氏非軍人，但

對韓同志所陳計劃，認爲可行；乃令省公路局抽調車輛，把黔西保安團向東輸送，實行集中攻擊。三個保安團集中後，向施洞口施行突擊，一舉而佔領之，即深入苗嶺地區，專門消滅匪之主力。戰事進行，先後不過三個多月，鎮遠等要邑，都告克服，戰爭告一段落。再經過一年的撫剿，兼施，全部解決。蔣公對於黔匪的剿滅，深爲嘉許，並指示善後事宜，頒布下列諸事：一、澄清吏治，防患未然；二、整編保甲；三、精練警團；四、嚴防貪污；五、救濟春耕；六、健全人事；七、肅清烟毒；八、破除迷信。由省府通令全省各縣，一體遵行。

反對火焚保全貴陽

此外，尚有一事，值得一談的，就是他對於貴陽市的保全。三十三年冬，日軍自廣西循黔桂鐵路，向黔南直迫，一時人心惶惶，情勢緊張。中央特派黨政軍要員多人，專程來黔，商議對策，集會花溪公園之南明堂。白鼻子小丑曾火焚長沙的張治中，也參加會議。張某在會中竭力主張火焚貴陽市，迅速後撤，以烏江爲前線。會中空氣，非常緊張而激動，各人都懷着沉重的心情；但張某主張，也沒有人據理力爭，會議既散，吳氏中央特派黨政軍要員多人，專程來黔，商議對策，集會花溪公園之南明堂。白鼻子小丑曾火焚長沙的張治中，也參加會議。張某在會中竭力主張火焚貴陽市，迅速後撤，以烏江爲前線。會中空氣，非常緊張而激動，各人都懷着沉重的心情；但張某主張，也沒有人據理力爭，會議既散，吳氏

爲震怒。這位青年縣長已備妥辭呈，並且說明該縣腹地只此一帶，如予剷除，民將無以爲生，急切間又無救濟辦法，故願負違抗政令的責任，依法受懲。吳氏問他：今年之後，有沒有絕對剷盡的辦法，縣長以堅決的態度，答稱：有。吳乃嘉其有愛民之心，允其繼續任職，但以明年禁絕爲條件，否則兩罪並治，決不寬恕。吳常謂：他是法家的外貌，儒家的內心，執法須嚴，但須求立一個長沙，故黔人至今，仍感念不已。

法家外貌儒家內心

最後，我要談一談吳氏在黔的用人行政。吳氏對青年的任用，甚爲注意，他常說：政事如被老年人所遺誤，不如由青年來嘗試一下。但他對青年人也不是盲目的任用，他一定在任用之前，傾聽其言論，並注意其行動。如果是前言不對後語，舉止浮動，好作誇大之詞，那樣的青年人，他決不任用。旣加任用之後，他還是抱懷疑態度，經過相當時間的考覈，知其可信，然後放心的授以全權。他的考覈，也有幾個主要項目：如執行政令確不確實？辦事效率是否迅速而無誤？是不是愛惜百姓等等。有一位青年擔任縣長，還不過十日，吳氏即出巡該縣。該縣的公路兩側都是罂粟，按照軍事委員會的規定，黔省公路兩側二十里內的罂粟須一律剷除，吳氏見狀，大爲震怒。這位青年縣長已備妥辭呈，並且說明該縣腹地只此一帶，如予剷除，民將無以爲生，急切間又無救濟辦法，故願負違抗政令的責任，依法受懲。吳氏問他：今年之後，有沒有絕對剷盡的辦法，縣長以堅決的態度，答稱：有。吳乃嘉其有愛民之心，允其繼續任職，但以明年禁絕爲條件，否則兩罪並治，決不寬恕。吳常謂：他是法家的外貌，儒家的內心，執法須嚴，但須求立

法的本意，不可拘泥於法律的表面文字。

政治淵源用人標準

吳氏與楊永泰善，楊爲民初政學系的重要分子之一，故人皆以政學系分子視之。又以其常在段內閣任事，故亦有以安福系視之者。吳與安福系有淵源，但安福系失敗後，即無往來，但在北

方局勢緊張，吳即策動段祺瑞南下，段系如王克

敏、王揖唐等，後來都被日本人利用而成漢奸，段

氏之得保晚節，實吳氏有以助成之。此事深爲最

高當局所嘉許，曾函段氏，尊爲芝泉夫子，並敘

述在保定軍官學校受教時之關係。當時蔣公以

志清官名在校受訓，以不堪日本對國人之侮辱，

憤而離校，時段正任保定軍校監督。有人認爲最

高當局即以此事而器重吳氏，殆亦未必盡然。我

們但看吳氏在擔任實業部長後，即與日本實業界

多所往來，即可理解最高當局頗有可能運用日本

實業界以緩和日本軍人之對我侵略。至其是否爲

政學系或政學系是否尚有此一團體在國民黨政府

中活動，似乎都有問題。但吳氏則極不承認其爲

政學系分子。有中央政校畢業一批，持陳果夫同

志介紹函至黔求職，吳囑稍候，人或疑其爲敷衍

，以後來的事實證明，絕非如此。他的稍候，是

他正在準備一個青年訓練班，即以各方介紹之青

年入班受訓，政校學生當不例外。後來這批青年

，面詢吳氏，吳亦僅以甚佳答之，以後也並沒有特別招呼。吳認爲青年人需要歷練，不可驟加重任，以增其驕氣或日後的失望，其言似頗堪注意。吳氏在黔，關於用人方面，以才與德爲標榜，而不講關係，惠夫同志事，或可爲一例歟？

治事有則但不拘泥

吳氏尚法，令出必行，但不拘泥，在貴州，也有不少的事例，茲略舉數則：

國立貴州大學的前身是省立工專。既改國立

，則一切供應如配給米等，都應國家擔任，貴州

省政府即不負任何責任。但中央配給，有時遲到

，有時品質稍差，貴大校長請貴州省政府支持，

多方交涉，未獲效果。貴大校長乃商於吳主席，

由其下手令給貴筑縣長照撥，貴筑縣長頗感爲難

，如發給則縣府不勝其負擔，且亦與體制不合。

乃共同赴省府請示。吳主席問貴筑縣長：能不能

發？縣長答不能，吳氏亦不相強，並不以已下手

令而爲辦不可。

日軍突入黔南以後，中央軍至黔者甚多。當時軍中給養，都由軍政部負責，就地採購，亦由

部隊自理，駐防地區的縣長，能協助者協助之，

亦無出錢的義務。駐軍對當地縣長，嘖有煩言，

亦有爭至省府者。吳氏在循名覈實的原則言，對

人一般的缺點，知之甚審，故其臨別贈言，饒有

意義，我黔人其深省之。

對貴州人臨別贈言

吳氏對貴州人的看法，也有值得我們深自警

惕之處。他在就任文官長而向省參議會辭行時說

：貴州多山，一開門或一出門，便見到山，處羣

山中，所見者小；希望此後多建高樓，擴大視線

。其對黔人所見者近而且小，溢於言表。吳氏任

黔主席先後達七年之久，各方面接觸甚多，對黔

人一般的缺點，知之甚審，故其臨別贈言，饒有

意義，我黔人其深省之。

吳氏主黔政期間，與我的合作，始終緊密無間，我們對黔省建設的目標，完全一致，大家都

沒有私人的利益和私意，所以極容易取得信任。

我不敢說吳氏對我言聽計從，但我的構想和我所

遇困難及應付辦法，都得吳氏支持，我能對貴州

建設，有若干微不足道的貢獻，和吳氏的支持是

大有關係的，三十多年後回憶和吳氏相處的經過

，仍不能不使我有一分知遇之感。當我花甲生日的時候，吳氏還賦詩祝賀。其親筆所書花溪題壁，亦頗可喜，詩云：

萬里長征人意倦，漫將西嶺作東山。
未知一臥青溪上，借得魚鷗幾日閒。
借得長竿伴客游，投竿賣劍幾時休。
殺賊功名殊未了，幾年遲我為身謀。

臨流不斷非非想，那有魚龍上釣鉤。
得專一壑勝一州，早買青山待白頭。
論家，他還勉強可以接受，足見其胸懷。他又曾說：「我不歡喜人稱他為政治家，他說如果稱他為評論家，他還勉強可以接受，足見其胸懷。他又曾說：「我不歡喜人稱他為政治家，他說如果稱他為評論家，他還勉強可以接受，足見其胸懷。他又曾說：「我不歡喜人稱他為政治家，他說如果稱他為評論家，他還勉強可以接受，足見其胸懷。」

我們在公餘輒作無所不談的聚晤。吳氏嘗言：「受寵若驚」，也許我的知無不言的慙勤，使他亦娟秀中有蒼勁氣。詩中頗有山林廊廟之意，亦可見其胸襟之一斑。

對我青眼相看，言猶在耳，而先生歸道山者已三十多年，人生如寄，思之慨然。我常常說，如有人說吳主席在貴州有所成就，我有一分；如果有

人說吳主席在貴州做錯了什麼，我也有一分，但如有人說吳主席在貴州沒有做什麼事，那我要斷然否認，在這裡我要為貴州歷史作見證。

第二三黨的興亡（續完）

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一

王覺源

章伯鈞一頁捐客史

第三黨的領袖，過去自然是已死的鄧演達。自民國二十四年改稱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以後，一切活動，則以章伯鈞為中心。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黨章中，且表明「奉鄧演達的政治主張為基本政治綱領」。即自認為第三黨的第二代的領袖。章伯鈞安徽桐城人。生於民前十七年。湖北武昌高師與德國柏林大學畢業。留學德國時為與鄧演達發生關係之始。原為中共黨的國民黨員。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鄧演達組總政治部主任時，荐章任政治部科長。鄧演達組

織「中華革命黨」時，章為其最得力的助手。並主編該黨機關刊物「燈塔」、「思潮」等，為該黨的次級人物。二十年八月，鄧演達和其黨徒十五人被捕，章幸為漏網之魚。鄧演達死後，黃琪翔、徐謙、譚平山等，相繼脫黨，另立門戶。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章嘯聚殘餘，復活第三黨之後，遂成為該黨的首要。

章伯鈞為人，好大喜功，不務實際，性情急躁，做事草率。野心大，領袖慾亦強。原係共產黨徒，因自行脫黨（這是國民黨清共時期普遍現象）而被共黨開除。其人不但生活貪污腐化，待人尤為虛偽狡滑。談話應事，常不着邊際。一切愛

慕排場架勢，在朋輩之中，早有「典型官僚」之名。組織所謂第三黨，僅有少數上層份子，毫無基層羣衆。一意企圖拉攏各黨各派人士，以為己用，利作抬高身價的工具。他在民盟之中，即素被人目為貪空賣空的「政治掮客」。投靠中共以後，一切活動，則完全聽命於中共。該黨創立之初，原欲在國共兩黨鬥爭中，投機取巧，採取騎牆主義。一方面保持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應付中共。一方面主張所謂「科學的三民主義」（即曲解的三民主義），以欺蒙國民黨與國人。可是中共絕對是不容許走中間路線的。章伯鈞卒因陳家康之壓迫與介紹，祕密的恢復了共產黨